

众志成城，黄洋界上以少胜多

■王世枚

90年前的今天，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打响，井冈山军民在红军主力在外、敌军大举来犯的不利形势下，以3个营兵力对抗敌4个团进攻，不但成功保卫革命根据地安全，还一举击溃来犯敌军，创造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探索了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

英勇顽强保卫家园。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是红军指战员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当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并不在井冈山上，留守井冈山的只有3个营兵力，而来犯的敌军总兵力达到了7个团。面对如此悬殊的敌我实力对比，有同志认为，敌人来势凶猛，兵力多、武器好，主张暂时转移，把伤病员转移进深山密林，部队运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而敌人不可能在此地久留，时间稍长自然会离去。在井冈山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朱云卿、何捷等为代表的红军指战员展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和极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综合考虑撤退与坚守的利害得失后，最终决定坚守井冈山大本营，制定科学的内线坚守方略。首先，坚壁清野，使进山敌人饮食无着、不能持久；其次，利用赤卫队袭扰敌人、捕捉敌人哨兵，在敌人交通线上打击敌人，断绝敌人粮草供应，使敌人日夜难安；第三，派出31团1营2连，在永新三湾地区游击作战，牵制、袭扰敌人后方；第四，安排31团主力和32团2营防守黄洋界等五大关口，32团1营坚持在茅坪、半冈山、砬市、大陇、古城打击游击，策应守山部队。



黄洋界保卫战，我军依靠人民群众以少胜多

从军事指挥角度看，这一防御计划跳出传统防御战的被动思维，既有对要害地段的重点防守，又有对外围地段特别是敌人后方的袭扰牵制；既对主力部队和赤卫队作出合理优化部署，又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方内线作战优势，同时利用阵地战、游击战、心理战等作战形式，做到有防有攻、守中带攻，为夺取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进犯的湘军、赣军为保存实力，本就各怀鬼胎，在四面喊打声中根本摸不清头脑，作战决心严重动摇。

预设战场克制强敌。黄洋界保卫战，是红军善用地形地貌作战的典范。敌我两军对抗的主战场，集中在罗霄山脉中段、万洋山东北端的黄洋界，南离小井10余里，东到茨坪20余里，是井冈山的北大门。此地海拔1343米，山上立岩绝壁，陡峭难行，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顶，道路两旁就是陡峭绝壁，峡谷一眼望不到底，地势极为险要，军事上易守难攻。红军指战员在兵力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动员除正规军外一切可以动员的军政干部、革命群众，仅用一昼夜时间修筑、加固哨口工事。从哨口通往大陇方向的小路上，以及通往茅坪的小路上，分别筑有5道工事：第一道是竹钉阵，在两条小路旁的草丛里布下几里长的竹钉防线；第二道是竹篱笆障碍和铁丝网；第三道是滚木礮石；第四道是5尺多深的壕沟，沟底安置竹钉；第五道是堑壕和用石头筑成的射击掩体，掩体前沿的草丛里也插满竹钉。

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里的“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说的正是党和红军对井冈山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动员力。据参战的红军党代表刘型回忆，“在黄洋界保卫战中，除了参加战斗的正规部队外，赤卫队持各种旧式武器夹杂着少数钢枪，担任警戒，配合作战。妇女们组织后勤队为前线服务。儿童团、少先队在防务委员会和工农兵政府的领导下，全部动员起来了，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严防敌探进出。”敌人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却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赣军第9师师长杨杰战报称：“且此处数十里无村落人烟，形同荒岛，给养无法接济，嗣因兵士饥不可耐。”

真实历史中，黄洋界上的炮声，总共打了3炮，前2炮还是哑炮，只有第3炮命中湘军指挥部，重伤湘军团长陈纪良。其实，最后决定性的一击，还是井冈山根据地军民齐上阵的心理战。在湘军进攻受挫之际，红军指战员抓住有利战机大造声势，一时间，山上木石齐发，火枪齐鸣，点燃铁桶中的爆竹，如机枪连发。红军吹响军号，摆出主力红军回来的架势。山上的赤卫队员和革命群众也挥舞着红旗高声呼喊。湘军草木皆兵，真以为是红军主力杀回来，赶忙撤退。赣军一个团正准备经茅坪进攻黄洋界，听到湘军败退的消息，根本不敢再战，立即逃回永新。以革命群众为基础的人民群众，是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源头。

(作者单位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原典

空城计在《三十六计》中的原文为：“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活。”意指本来兵力空虚却故意显示出不可防守的样子，使敌人难以揣摩，不敢轻易来犯，在敌众我寡的紧急时刻，运用这种策略，更加奇妙莫测。“空城计”是一种心理战术，主要利用对手心理的相对弱势，因敌而用，因难而见巧，体现出《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的作战思想。

古代战例

唐朝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吐蕃进掠河西地区，攻陷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河西形势不稳。为扭转战局，抵御吐蕃入侵，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兼盖嘉运军使。

张守珪到任瓜州时，吐蕃军队刚撤离不久，瓜州城已残破不堪，吐蕃又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形势非常严峻。时不我待，张守珪马上组织幸存军民修筑城墙，但修城工作刚刚开始，吐蕃军队突然兵临城下。守城军民一时不知所措，张守珪则非常冷静，他先是布置军民固守，之后命人在城上大摆酒席，会集将士饮酒作乐。这时吐蕃已经把瓜州城团团围住，却见城上唐军推杯换盏，泰然自若，全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时摸不着头脑，迟疑观望半晌，以为有诈，不敢贸然攻城，最终决定撤退。张守珪在城上见吐蕃退去，立刻下令部队追击。吐蕃更认定唐军预先设有埋伏，丧失斗志，大败而逃。

现代战例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陕北转至河北省石家庄西北的西柏坡。10月，蒋介石得到重要情报，解放军在石家庄地区力量空虚，他紧急命令傅作义派遣20万大军偷袭石家庄。当时，保卫中共中央驻地的只有警卫部队和部分地方部队，情况非常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一方面积极准备进行军事防御；另一方面，毛泽东于10月下旬，亲自为新华社草拟了3篇

政论性电讯，实施“空城计”。这3篇电讯，披露了国民党偷袭石家庄的企图，对敌起到了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敌军将领纷纷认为行动已暴露，我军必然严阵以待，继续偷袭将有去无回。而傅作义的决心最终也被动摇。1948年10月31日凌晨，傅作义给副总指挥郑洞国、副司令李天寿、副参谋长李振球等发出特急电报：“共军援石部队返冀，着你们部克日撤至方顺桥。”至此，蒋介石偷袭西柏坡的行动宣告破产。

计谋分析

自古兵家最讲究“兵不厌诈”，空城计是一种攻心战术。在己方无力守城的情况下，故意向敌人释放混乱信息，扰乱敌方的判断。

古人用兵，讲究的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强调隐真示假，迷惑对方。空城计却打破以往兵家的常规用法，以违背常理的计，甚至冒险故意暴露自己弱点，使对方疑虑重重，不敢进攻，也就是所谓“疑中生疑”。使用此计，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择机而行，尽量慎用。空城计是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采用的疑阵，借以迷惑敌人，渡过难关。一方面，这种方法多是在敌强我弱、兵临城下的态势下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如果被敌人识破，乘虚而入，是十分危险的。另一方面，空城计能否成功，取决于敌人最终的行动。也就是说，虽然计谋主动权在我方，但最终效果取决于敌方反应。因而，空城计是悬而又悬的“险策”，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缓兵之计。此外，现代战争中，随着科技发展，侦察手段越来越多，要想隐藏真实实力，欺骗迷惑对手，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空城计要在确保敌方不清楚我方真实实力和意图的前提下，择机而行，尽量慎用。

二是要了解对手，因敌而用。空城计与其说是一招作战计谋，不如说是一场心理博弈。使用此计的关键是要清楚

了解并掌握敌方将领的心理状况和性格特征。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指挥官越是谨慎多疑，效果就会越好。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几万大军的情节虽是虚构，但也能看出这一点来。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是因为司马懿生性多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诸葛亮了解司马懿，料定他会判断自己“一生谨慎不曾冒险，城门大开必有埋伏”，故而空城故意示之以空，“虚者虚之”，才能让司马懿“疑中生疑”，下令撤退。如果换成对方是个狂妄鲁莽之人或有勇无谋之辈，诸葛亮纵然神机妙算，也绝不敢轻易使用空城计。

三是要结合形势，因情而用。空城计主要体现《孙子兵法·虚实》中“兵无常势”的思想，既不按刻板的模式，也没有固定的套路，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和形势，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核心思想是“随机应变以制胜”。也就是说，空城计并不一定要以“空城示之以空”的方式使用，而要结合形势，因情而用。只要能在心理上威慑对方，一样可以达到目的。例如，毛泽东对偷袭石家庄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空城计，并不是气定神闲空城以待，而是通过揭露和宣扬对方偷袭企图的方式，对敌起到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使对方兵马来未动，阵脚先乱，进而动摇傅作义作战决心，令其取消作战计划。

“帕提亚人的回马箭”

公元前247年，伊朗高原东北部一个名为帕提亚的游牧部落崛起，占据全部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一部分，史称帕提亚帝国，汉文史籍称为“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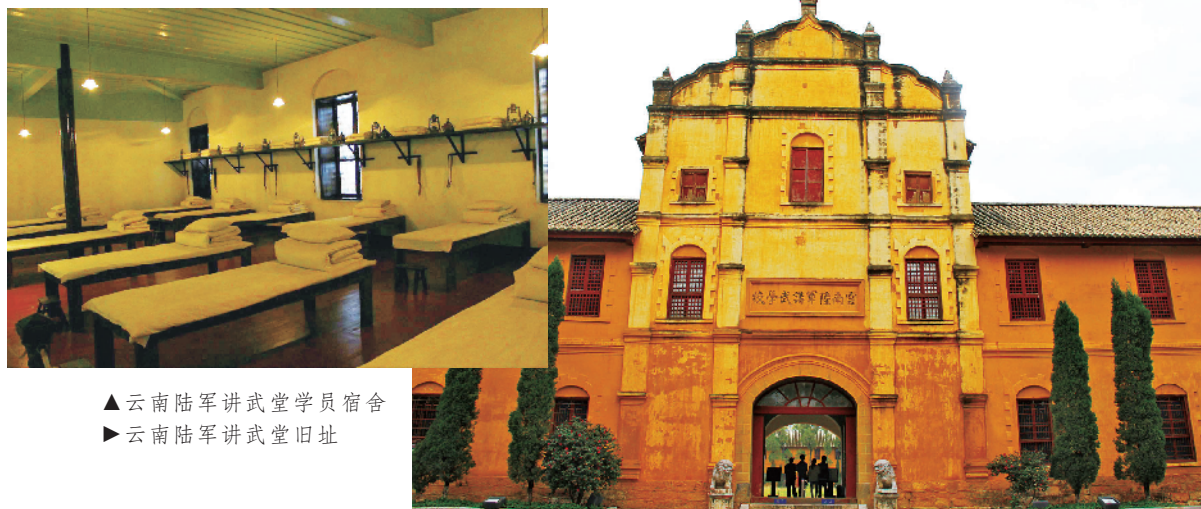
帕提亚帝国拥有当时首屈一指的骑兵部队。帕提亚骑兵部队由重骑兵和轻骑兵组成。重骑兵人马皆披挂铠甲，使用长矛作为武器。轻骑兵则是骑马的弓箭手，不穿铠甲。轻骑兵的弓箭为亚洲复合弓，采用木头、动物的角和筋腱加工而成。帕提亚的轻骑兵能够在进攻时，迅速调转马头的方向，在马转向的同时，轻骑兵也转过身从马上向敌射箭，这种战术被称为“帕提亚人的回马箭”。

6根桅杆的反潜舰

在风帆动力时期，军舰多采用多桅设计，毕竟桅杆多，帆就多，能够获得更高的航速。现在使用蒸汽机、内燃机等动力的军舰，一般有两个桅杆，在一些小型舰艇上通常为一个。这些桅杆多用来安排雷达等电子设备。

但也有“另类”，那就是苏联研制的61型大型反潜舰。这种设计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潜舰，排水量3500吨，虽然名为反潜舰，但苏联海军在美国海军的压力下，要求该型反潜舰尽可能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各种武器装备当然少不了电子设备的加持，为了安排对空搜索雷达、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导航雷达、舰炮火控雷达、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等各种用途雷达和电子设备，苏联人在61型大型反潜舰上共设计了6根桅杆，这一桅杆数量，在军舰彻底放弃风帆动力后，可谓是在前无古人。而随着能将多种雷达电子设备整合入一根桅杆的一体化综合桅杆技术的发展，61型大型反潜舰的6根桅杆应该也是后来无有者。

(乌沃)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宿舍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近现代中国著名军校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

■黄海吉

1909年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创办。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来的云南腾冲人李根源出任讲武堂监督，不久后接任总办(校长)一职。李根源把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融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建设中，亲自选定校址、设置学校机构、制定讲武堂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操场面积广阔，可容万人之众，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罕见，曾有“保定的课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的说法。

云南陆军讲武堂设步、骑、炮、工四科和甲、乙、丙三个班，以“坚忍刻苦”作为校训，教官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制度和作风也仿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纪律要求非常严格。早晨有体操和跑步，白天有军事课程，晚上有自习，夜间还有紧急集合训练，平均每天上课6小时，出操2小时。在完善的课程、严格的教学和高标准的纪律要求下，云南讲武堂的教学质量远高于当时国内其他军事院校。

虽然清廷开办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初衷是维护清王朝统治，但这所学校自创办之日起，主导权就掌握在革

命党人手中，从校长到教官几乎全为同盟会成员。学校经常明里暗里宣传革命大义、反清思想，还组织学员观看滇越铁路通车，用法租界者耀武扬威的现实素材，激发学员反帝爱国情绪。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震撼着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大地。10月30日晚，李根源、唐继尧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和蔡得将等一起，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农历九月初九)，推翻满清在云南的统治。辛亥革命胜利后，蔡得、唐继尧先后就任云南都督，讲武堂更名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校建设不断加强完善，管理教育进一步正规化，学员“应、对、进、退”均有规定，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要求对百姓和善礼貌，购买公债、严禁禁烟。在护国战争中，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冲锋在战斗第一线，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分庭抗礼，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滇军“入川一军死亡兵额，前后不下十万”。

1916-1922年间，云南讲武学校在徐州、韶关、广州等地陆续开办5所分校。学校前后开办22期，共培养各

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为中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人民军队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叶剑英，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军长周保中等人，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抗日战争中，唐淮源、寸性奇、陈书等讲武堂毕业的滇军将领战死沙场。朱德元帅曾把母校称为“中国革命的熔炉”。此外，朝鲜最高人民委员会委员崔庸健、韩国首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炯、越南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也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生。云南讲武堂与保定陆军学堂、黄埔军校一起，并称近现代中国三大著名军校。

(作者单位为77649部队)

